责编：兰文飞 E-mail:lanwenfei@126.com Tel:010－62806237

◆重点推荐

“补课发展”任重道远

□徐伟新

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最根本的动力，也是最活跃的因素。中国开启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实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人民的伟大壮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征。经过30多年的艰辛探索，中国正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既进入经济社会急剧转型期、深化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同时也是加快改革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期和黄金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继续深化改革开放，需要牢牢把握好国际东西战略关系调整的重大机遇，积极解决好国内东西区域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补课发展、改革发展、开放发展、科学发展，以生产力的大发展引领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过程。

面对当前深化改革与聚力发展的现实需求，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了刘光溪博士新著《补课发展论》。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比较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发展经验，大跨度审视美欧等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对客观地提出中国经济正处于半道爬坡过坎的十字路口，改革正进入河中咽喉攻坚的“深水区”，创新性地提出我国目前整体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半工业化、半市场化、半城镇化、半信息化和半国际化的“五半”课题，中国生产力依然落后，补课任务依然艰巨。

现实倒逼理性，理性指导实践。作者作为学者型官员，曾长期参与中国入世谈判并多年在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工作，近几年又积极倾力投身西部大开发、沿边开放和人民币周边国际化的发展事业，全身心投入改革开放基层实践。基于长期实践倒逼理论，多年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所思所悟，以及扎根基层实践锤炼和服务基层民生的情怀和见识，大胆从中国现实发展需求的视角，立足新的时空观、历史观和实践观，客观联系改革开放中的现实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补课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提出中国要想在空间层面上进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阶段，要想在不远的将来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担当国际大国的责任，要想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清醒认知发展中的中国最大、最急迫、最现实的国情是紧紧抓住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不失时机，深化改革，坚持开放，与时俱进，继续在时间层面上坚持“补课发展”，毫不动摇地发展先进生产力，“补”发达国家三次工业化与科技革命推动国家生产力快速提升的“课”。

《补课发展论》一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作者践行改革，沉入基层，通过实践倒逼理性鲜明提出，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一个生产力补课追赶的过程。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发展尚谈不上什么超常超前，也谈不上什么创优领先，经济发展、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等，都是补课追赶过程的应有之义，中国“补课发展”依旧任重道远。作者认为坚持中国“补课发展”的战略选择，取决于干部的“修文正德”，能否理性提升对“补课发展”的认识、意识和共识，对社会发展时局与方位做出理性分析和科学判断，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做出科学决策，并在实践中求真务实、善于思考，勇于变革，敢于创新；取决于对发展半道过坎的“市场”导向选择，坚定不移地推进实施“城镇化”方略，秉持“市场化”导向选择，全力构建“城镇化”与“市场化”双轮驱动的中国经济发展运行体系及“沿海开放”与“沿边开放”双翼齐飞的中国区域平衡发展协调格局；取决于金融改革突破的民生路径选择，深化改革的时间顺序上关键在于重点领域的突破，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上核心在于区域增长极的培育，主张把金融体制改革作为经济改革的最大红利，深化由大一统到放权让利的金融体制改革，并注重普惠金融，推进金融民生化、市场化和区域化，整体推进深化东部“沿海开放”与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构建沿边开放的“陆上珠三角”，并把打造培育云南桥头堡作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增长极；取决于对拓宽开放战略做出共赢视野选择，必须维护好战略机遇期，对内统筹好东西区域协调发展，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对外掌控好东西美中关系，倡导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围绕大力推进沿边开放战略和有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两条主线，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寻找利益共同点，在构建命运共同体，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中，实现共赢博弈、互利合作、权责共担、和平发展。

《补课发展论》作为一本具有一定独创性的专著，思想深刻、内容丰富、语言生动、特点鲜明，具有较强的学理性，彰显了作者长期的学术积累；同时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鲜明特征。作者勇于实践、视野开阔、思维活跃，紧紧围绕“补课发展”的主线，对改革的一些重要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客观厘清了当前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所面临的复杂形势，注重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找准改革脉搏，坚持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的有机统一，把握好理想与现实的平衡，发展连续性和稳定性相协调，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相配合，科学研判改革棋局，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质的认识，在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同时，确立党的执政自信，为理解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把握深化改革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思维框架。

更为可贵的是，刘博士虽然全身心倾注地方发展，但多年保持勤学敏思习惯，不因繁杂的日常行政事务而改变，也不因加快推动地方发展的巨大工作压力而放弃，始终秉持“政从正来，正从文来”和“修文正德”的施政理念及价值标准，主动践行“正德”价值选择，积极倡导推动政治生态文化的改良、改善和改进。作者提出“三个百年”目标，全身心为推进沿边开放，推动人民币在周边“向南走，走出去”，加快推进以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打造构建为龙头主题引领，以云南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开发创新为贯穿主线带动与以泛亚金融产业中心园区为物理主体承载的“一心两区”金融联动发展建设总布局，探索前行，挥汗担当，勇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这艘巨舸前行的摇橹者。

《补课发展论》，刘光溪/著，中国商务出版社2013年7月版

◆书而思

优化执政党的传媒治理

□王长江

传媒是人类社会传递信息、进行沟通的重要工具，因而一度被当作增强政党影响的手段来研究。然而，当今世界传媒技术高度发达，特别是社交媒体、自媒体的迅速增多和移动互联终端的广泛运用，使得传媒越来越作为一种独立的民意表达渠道和工具。传媒不仅能够为政党增加影响，而且可以挤占一部分原来属于政党的领地，取代政党的一部分职能，削弱政党的影响力。因此，如何与传媒相处，成为世界各国的政党、政府都十分关注的课题。

当前涉及“执政党与传媒”的相关研究，普遍强调要改善党对媒体的领导，要善于运用好传媒这一重要的执政资源。这无疑是重要和必要的。但是，究竟如何认识当前国内国际环境下“执政党与传媒”的互动关系，如何改善执政党对传媒的领导、实施有效的传媒治理，面向实际的深入研究仍远远不够。李舒的论著《执政党的传媒治理》以治理理论为依托，在政治学和新闻传播学的双重学科视野下，探讨了转型期党和政府对传媒业实施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与规范。她不仅提出，执政党应该更新观念，提高传媒治理的科学化水平，而且直接回应现实需求，就如何构建科学的传媒治理结构、如何完善传媒治理的手段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分析。这项研究，不仅拓展了党建理论研究的视野，而且对于认识和解决执政党与传媒互动中的一些难点问题颇具现实意义。

在我看来，本论著可以在若干方面启迪我们的思考。

一是把传媒治理这一论题放到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的双重维度下来考量。回顾历史，我国传媒业的发展一直是党政主导下的强制性变迁，与传媒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政治、经济的起伏变迁表现出一致性。可以说，在这方面，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过不小的教训。在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放眼国际，西方国家在传媒治理上纷纷采取“放松规制”的政策，带来传媒企业大规模的并购、整合，我国传媒业面临的国际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国际信息流向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这双重维度形成了传媒治理研究的坐标系。无论是对传媒体制、治理结构、治理手段等方面存在问题的剖析，还是对构建科学传媒治理结构、健全传媒治理规范体系的探讨，对这一背景了然于胸，才可能做到分析中肯，持论中正。

二是深入讨论了传媒治理的体制机制问题。当下传媒业的发展对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影响进一步凸显，以深化传媒体制改革来推进传媒业发展是执政党的必然选择。在传媒治理的体制机制问题上，难点是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如何既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又通过体制机制的调整，释放传媒业的能量，推进传媒产业实力的提升和传媒公共属性的充分发挥。作者围绕这一难点问题，对重构党政与传媒的关系、建立以党政为主导的多中心治理结构等进行了前瞻性的探讨，具有相当的实践价值。

三是厘清了一些模糊认识。特别是在传媒经济领域，一些有关完善传媒治理体制机制的关键问题常常被忽视。针对此，对一些极易混淆的概念或似是而非的认识，本书在适当的地方分别予以了区分或澄清。比如：传媒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怎样体现的；传媒产品为什么既有可能是公共品也有可能是消费品；建立现代传媒产权制度中如何认识所有权与产权、怎样理解国有和公有；传媒公共服务体系的受众与一般意义上的受众的区别在哪里，等等。对于一项研究来说，廓清概念是理性逻辑的基础，逻辑严密才会具有说服人的力量。

四是提倡并贯穿了信息论的思想。作者坚持将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来看待，并将执政党的传媒治理置于这一前提下来剖析，这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提升了传媒治理的层次。从认识论上看，在信息论的框架下分析执政党的传媒治理，强调的是“通过政策、法规、契约等形式引导传媒机构，实现对信息的性质、数量、强度、流向等的控制”，以及“对公众接收、利用信息的均等化配置”，这有助于避免走入将“传媒治理”等同于“控制传媒”的误区。从方法论上看，信息论思想的导入，使执政党的传媒治理更着眼于从整体和顶层出发，变以往零散、微观、被动的状态为讲究系统性、能动性的宏观领导，从而更好地履行治理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

“骅骝日千里，亦在御功者。”如果说当下以不断革新的传播技术为支撑的传媒是“骅骝”的话，那么其能否在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作用、贡献力量，能否在更加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发出中国声音，能否在日趋激烈的国际传媒业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离不开“御功者”——执政党的科学治理。执政党传媒治理的优化，是建立在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以及治理结构、治理手段等的一系列转变之上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能否在传媒治理的理论和模式上自觉地做出相应的转变，无疑是问题的关键也是难点所在。

对于党建研究，我主张将理论研究与工作性质的研究相区分，把党的建设纳入政党政治的视野范畴，落脚在研究和把握政党活动的规律，唯此，党的建设才能成为一门科学。同时，政党研究不仅仅是关于政党自身和政党体制的研究，还要把政党放到整个政治系统当中去，探讨政党和国家、社会中的诸多元素之间的关系。就社会来说，可以分解成诸如阶级、群体、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传媒等元素，政党与这些元素之间的互动，都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都应当给予足够的关注。遗憾的是，相关的专门研究还比较有限，从这个角度来看，《执政党的传媒治理》在丰富党建研究内涵上做出了努力，具有特别的意义。因此，这些文字，与其说是序，不如说是期待，期待更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加入进来，用各自的专业背景和丰厚的学养丰富党建研究的视角和内涵，共同推进党建研究科学化水平的提升。

《执政党的传媒治理》，李舒/著，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3月版

◆好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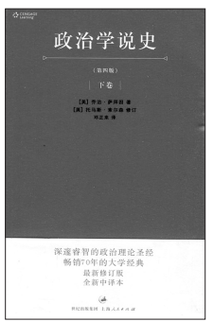


书名：《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作者：[美] 大卫·哈维/著 刘英/译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4月

作者谈书：我的目的是促使你们去阅读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且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去阅读它。我所鼓励的是你个人面对这一文本的经历，是直接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研读，是你将开始形成对他思想的独立见解。自1971年以来，我几乎每年都会教授《资本论》，甚至一年中讲两三遍，而且针对各种不同的人群。在过去几十年阅读《资本论》的过程中，人类的地理、历史和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实际上，我喜欢每年都讲授《资本论》的一个原因是，每次我都必须问自己，应该以何种不同的方式阅读它，它又将带给我之前未曾注意的何种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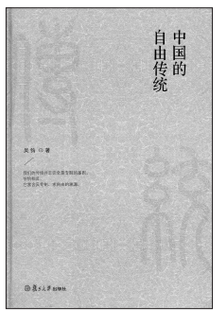


书名：《政治学说史》（上下卷）

作者：[美]萨拜因/著 邓正来/译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1月

编者谈书：在本书中，萨拜因不仅对政治学说从理论上做了探讨，而且从历史的角度对古希腊以来两千多年的政治学说的形成、演变和发展做了系统的阐述。该书内容广泛，史料丰富，是其他同类著作难以比拟的，自1937年问世后，就被西方许多国家列为政治学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在我国今天的政治学研究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此次根据最新修订版译出的全新中文本，在学术规范等诸多方面较之旧译本均有提高。



书名：《中国的自由传统》

作者：吴钩

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

编者谈书：本书主要论述从秦至晚清时期的中国历史并非只是一部“专制”的历史，同时，也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不断推进社会自治、抑制专制、追求自由的历史。作者认为，视中国历史仅为专制史，视中国传统仅为专制的传统，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无知。本书叙述流畅，观点鲜明，史料充足，形式新颖。



书名：《寻求中国民主》

作者：[澳]冯兆基/著 刘悦斌等/译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年2月

编者谈书：政治民主化是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来最主要的潮流之一，也是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仁人志士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以往史学界对中国追求民主的探索，多集中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民国时期的民主运动着墨不多。本书作者冯兆基认为，中国民主运动最强劲的势头出现在1929—1949年间，本书考察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民主思想形成的内因和外因，对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民主的历史作了引人入胜的描述，为以后对这一时期中国民主运动的研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坚实的基础。

◆治学方法

从杨朱悲歧路谈治学路径

□郭继民

《列子》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

杨朱的邻居丢羊后，不但发动全家人去寻羊，而且还请求杨朱的童仆帮忙。杨朱纳闷：丢一只羊，何至于如此兴师动众？邻居道：因为路岔道多。忙活了一天，最终邻居同众人却无功而返。杨朱问其因，邻居回答：岔道中还有岔道。于是杨朱脸色忧愁，一整天不语。

故事讲到这，耐不住性子的“哲人们”便开始了不同的解读。譬如，笔者就从“岔路”联想到人生道路的选择，因为人生面临着诸多选择，而每一种选择甚至代表着一种命运——也许选择本身仅仅在一刹那的功夫，然而问题在于当你选择一条道路的同时，也意味着你丧失了通往其他路途的可能性。选择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倘若选择失误，人生的路径就要改写了。

同时，就选择本身来说，还涉及“自由的困境”这一哲学问题。因为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自由，倘若人生没有选择的机会，那么人则为必然律的奴隶，毫无自由可言。可问题在于，当人处于多种选项下（每个选项皆不可预期）时，又势必陷入新的困境——选择的困境，这无异于套上了新的枷锁。应该说，工业社会尤其信息化社会，人们的选择太多，困惑也太多，结果造成了自由的悖论。此恰恰应验了卢梭的那句话，“人们渴望自由，然而无时不在枷锁之中”。

此乃从“选择本身”引发的不同解读，亦是多数人所能联想到的解读方式。

不过，杨朱的解答却意不在此。我们继续看故事的进展：

弟子很奇怪，又不是先生丢羊，为何先生如此忧伤。弟子孟叔阳将此事告之心都子（杨朱的另一弟子）。他日，二人请教杨朱。首先，心都子向老师讲了一个故事，说有兄弟三人在齐鲁之地向同一个老师学习仁义之道，学成回家，其父问何为仁义之道。老大回答，将生命置于荣誉之前即为仁义之道；老二回答，杀身成仁乃是；老三回答，同时保全生命与荣誉才是仁义之道。

杨朱没有任何评论，而是同样也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水性极好的人，来向他学习者络绎不绝。然而，其中淹死的几乎占到一半。本来人们是向他学游泳的，而不是学溺死的，孰知学习的结果，反差却如此之大，究竟谁对谁错呢？

心都子听后默不作声地退出。

孟孙阳特别纳闷，责询心都子：你问得拐弯抹角，老师回答得又稀奇古怪，我愈发糊涂了。

心都子回答道，路因有岔道而羊丢，治学的人则因为有太多途径而迷失方向。世间的学说并非根源不同，但是最后的结论却相差悬殊。所以，只有回到本源上去，返回到根本`上去，才不至于迷失。

这段话的主旨其实在替“老庄”说话。老庄哲学认为，道乃源头，为一；道分则术（从个人狭隘方面所理解的“道”）生，术最终造成人心困惑、道德坠落之困境。如庄子《齐物论》所说“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其意即言一旦道发生分裂，则形成物，对这个物而言，也许算得上成，然而对道本身而言，则是毁。譬如，将一树做成书桌，对书桌而言，由树变成桌，是成；对树本身而言，由树变成书桌，则是毁。更重要的是，人们往往为具体的物所惑，最终远离大道。因此，老庄要求持守大道，守素抱朴，而非让道分裂。

我们再回到“亡羊歧路”上去，羊最初在源头上走的道是一，然而当它分岔后（即道分裂后），变成多条，而这其中的每一条仍然有分岔，使得路愈分愈多，从而最终让人陷入困惑境地。所以，心都子非常理解杨朱：先生忧的不是找不到羊，而是忧患的大道分裂而造成的思想的混乱与困惑。为了印证自己的看法，心都子向老师讲了三兄弟学道的故事，以求教杨朱：道本无二至，然而到三兄弟这，道分岔了，三人的理解各不相同。果不其然，杨朱同样以讲故事的方式肯定了心都子：道本来是救人的，然而有些人却走向反面。

至此，故事似乎完结。告诫学者，要善于守死善道，不要被蔓延的枝节所迷惑。

若细细思索，“亡羊歧路”对后人而言，尤其对学术研究而言，仍有两点重要启示：

其一，真正的学问在本源上是通的。虽然就中国学术史而言，“儒（家）分为八”，“墨（家）分为三”，“道（家）分为二”，然而，根源上是却只是一个儒，一个墨，一个道。其实何止儒家、墨家、道家如此，诸子百家的学问根源上莫不出于六艺之学，只不过他们各取所需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儒、道、墨乃至兵家、阴阳等诸子百家在最高层次上仍然是通的，奈何后人器量窄狭了，遂造成各自为政、墨守成规之局面。此种状况即如庄子在《天下篇》所言：“后世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当然，扬雄在《法言》中说得更直截，“或问道。曰：‘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倘若学术上做不到通的地步，名气再大，估计也是难以得道的。

其二，对于每一宗、每一派，我们亦需作“同情理解”，甚至要鼓励这种“剑走偏锋”的学派研究。由于个人阅历、知识结构、理解能力、时代背景乃至学习目的之不同，人们对道各有所需亦在情理之中，此即西人所谓“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以西方哲学之解释学立场言，正是不同读者对经典的不同解读，才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多样化、深入化。因此，对学术上的“亡羊歧路”，我们又不必若杨朱那样过于悲观，而应当采取辩证、中和之思维，以“互逆双运”的方略来对待之。倘若此，那么，“亡羊歧路”的现象则又为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方面通过“道路分岔”而促进学术的发展与繁荣——倘若道不分裂，哪有诸种学科之形成；另一方面，又通过对道的回归、溯源，通过对经典的回归，从源头上获得通的智慧，修正我们的学术方向，而不至于使“分岔之学术”支离破碎、互相隔绝——因为反过来看，“道”最终乃是人们的终极追求。如此通过分统、收放之交互进行、互逆双运，方使得学术真正达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之境地。